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小明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重要但又相对薄弱的环节。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也产生了不少疑问。在这里把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写出来,以请教专家、同行。

“美国霸权”

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曾选修一门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在第一堂课中,美国教授对目前世界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状况的介绍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关系理论95%是美国人的,此外欧洲也有一些,而亚洲几乎没有东西。听了这话,我当时感到心里一震。课后仔细一想,此话并非毫无道理。

后来我在一位欧洲学者写的文章中也读到了类似的观点。这位学者指出,除了北美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很少。他认为,日本是北美和欧洲以外从事这方面研究人数最多的国家,可惜在那里产生的理论极少,而且是在按美国人的路子走。他还说,中国具有独特的哲学传统,最有希望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可惜迄今还没有独立的理论建设。于是,他得出结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还不是“国际学科”或“全球学科”,而是西方(欧美)学科,尤其是美英学科。接着,他通过对目前欧美几个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核心刊物作者分布的数据统计,证明在这个领域中,欧洲

和北美(主要是美国)的研究力量也极其不平衡,存在着“美国霸权”的现象。1970—1995年,美国4个国际关系核心刊物(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orld Politics)的北美作者占66%—100%,平均为88.1%。而美国另外两个政治学核心刊物(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美国作者所占的比重更高,分别为97%和96.8%。欧洲的4个刊物(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Millenniu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的作者分布相对平衡一些,北美作者占35%—50%,英国学者在前3个刊物中占35—45%,而最后一个刊物除了北美作者外,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作者(和北美作者大约各占45%—50%)。也就是说,即使在欧洲的核心刊物中,英美作者也居主导地位。

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美国霸权”或者“美国主导”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存在并且延续至今的事实。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曾经说过,国

Ole Wa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pp. 47—88.

际关系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另外据英国学者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35 年间出版并被称为“当代经典”的 22 部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美国作者(包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移居美国的研究者)提供了 18 部,超过总数的 80%。不仅如此,不少学者指出,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不仅仅反映在有关著述的数量上,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学派(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等)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美国。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哈佛教授认为,比较有特色的欧洲学派只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法国学派等。当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根源是欧洲的东西,包括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战后初期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居主导地位的那批著名学者,也大多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现在美国颇为流行的建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也有很深的欧洲背景。但是,源于欧洲的思想,经过美国学者的吸纳而变成了独特的学说。这也正是所谓的欧洲思想在美国的土壤“生根开花”。由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研究方法到语言都是美国式的,美国人似乎在制定该领域的学术规范。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讲授和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大都用美国人的著作,用美国人创造的概念。而且,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如果不用英语写作并在美国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则很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美国霸权”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现象同美国战后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反对“美国霸权”。在国际政治舞台批评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是属于

国际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而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美国霸权”现象却应采取学术的态度。应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美国霸权”现象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包括美国独特的学术氛围、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可观的研究经费等等非政治因素。总的来看,美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他国家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需要对此进行认真的吸收。当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同国家政治、文化等环境是分不开的。随着各国学者独立研究工作的展开和取得独特的研究成果,美国以外地区同美国学术交流的不平衡状况会有所改善。目前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学术交流中主要是输出,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输入,美国的“顺差”额是很大的。

知己知彼

谈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美国霸权”现象,再来看看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应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晚、起点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并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 41—60, 1977.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7—298 页。

同上书,第 299—300 页。

Kenneth W. Thomp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Ole Wa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7 页。

且获得很快的发展。最近 20 年来,在中国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学者们出版了一批译著和专著,学术刊物上相关文章数量日益增多。而且一些中国学者努力在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注意从中国的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希望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的介绍可以说已经比较全面。西方的理论、思潮产生后,很快就由中国学者发表相应的介绍文章,理论研究已经不再是闭门造车。

但是,由于学科建设时间太短等原因,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仍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理论的阶段,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还处于探索阶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家”和“经典著作”。要使中国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尚需长时期的不懈努力。

以上是关于中国和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比较。那么中国国内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最近就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文章,在互联网上进行了检索,以期大致了解作者的分布情况,比较国内各单位(尤其是各个大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状况。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开办的中国期刊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收录国内 6000 余种期刊的题目,以及 3500 余种期刊全文。目前国内主要国际政治类学术刊物基本上都收录其中。我在该网的经济政治与法律专栏查询了 1998—2000 年有关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有全文的)的作者分布情况。结果是:题目带“国际关系理论”字样的文章,共 23 篇,其中 21 篇文章分布在国内 11 家单位,1 篇

作者是国外的,1 篇作者不详。复旦最多,为 5 篇,大约占总数的 22%;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为 3 篇,大约各占 13%;接下来是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暨南大学(2 篇),山东大学、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校、外交学院、包头师专等各 1 篇。“国际政治理论”类文章,共 96 篇。其中 11 篇作者单位不详,2 篇是境外作者,其余 83 篇文章分布在 32 家单位。复旦和北大最多,各为 14 篇,大约各占总数的 14.6%。接下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9 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5 篇),外交学院和洛阳外国语学院(4 篇),南京大学(3 篇),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人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均为 2 篇。“国际关系理论”类文章,共 213 篇,其中 19 篇作者单位不详,1 篇文章重复收录,9 篇境外作者,其余 184 篇文章分布在 65 家单位。复旦最多,为 30 篇,大约占 14.2%。北大列第二,为 17 篇,大约占 8%。中国社会科学院列第三位,有 14 篇,大约占 6.6%。接下来是外交学院 12 篇,洛阳外国语学院 8 篇,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均为 7 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6 篇,人民大学 5 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内蒙古大学 4 篇,南京大学 3 篇,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人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军事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央编译局和西北师范大学都是 2 篇。

上面的查询仅仅是最近 3 年的情况,不足以反映全貌,而且很多文章实际上都

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 年第 4 期。

这个期刊网上的材料经常更新,本文的统计数据来自 2000 年 11 月 28 日的查询结果,特此说明。

不属于国际关系理论范畴,也有的文章没有被收录。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略知一些情况。我认为,上面 3 项查询至少可以反映两个基本情况:

第一,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单位和人员不少,这从文章篇数多和作者分布广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反映出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怀有浓厚的兴趣,它是这门学科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据我粗略估计,上述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而且有五成以上为在校博士与硕士研究生。越来越多的年青学人涉足该领域,无疑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了活力与生机。

第二,复旦、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洛阳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等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是该领域的研究重镇。3 项查询的结果比较一致,发表国际关系理论文章的作者集中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等几个单位,它们共占文章总数的 55%—75%。

不过,上面查询结果完全是数量上的,不涉及质量上的评估。做质量方面的评估比较复杂,需要本领域专家同行的努力。我认为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相关著述都属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类,著述水平也参差不齐,能把外来理论吃透并表述清楚的似乎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涉足这一领域的主要是在学的博士、硕士生(也有个别的本科生)以及一些年青教师,很多文章是介绍性和学习心得类的。但是不可否认,国内有些学者也发表了水平较高的作品。在我读过的著作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

治学:历史与理论》、复旦大学苏长和的《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外交学院秦亚青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 1945—1988》以及南开大学王正毅的《世界体系理论与中国》。我本人尤其欣赏秦亚青先生的那部专著。

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里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希望通过认识我们自己的不足,达到发奋图强的目的。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的缘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的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基本上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相互比较、学习和竞争,无疑有助于本学科的健康发展。

交叉学科

国际关系理论属于一门基础性学科,同时它也是一个多层面、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本身很复杂,涉及面很广,而为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提供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然也应该是多层面的。由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复杂性,一种理论是不够的,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内也根本不可能有包罗万象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需要不同的学派观点与分析方法来指导,“百花齐放”自然是促进本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这个学科的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需要格外努力,善于从别的学科中吸取养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同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关系密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吸取了养分,目前流行的建构主义则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很大。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新流派的产生往往都是从其他学科得到启示,甚至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

比如,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理

论的重要思想源泉是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理应学习西方经典著作和了解其宗教思想。了解西方宗教思想,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的认识。基督教里的“性本恶”或者“原罪”学说,即人生而有罪或堕落,根本无法信任人类。这是美国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思想基础。它实际上也就是美国乃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政治现实主义流派的思想基础,与国家追求权力和安全、“自助国际体系”以及势力均衡的论点密不可分。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学说中,我们可以发现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法、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学科知识。国际关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需要从其他学科吸取养分,以获得自身的发展。当然,现在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情况极其普遍,大概没有一门学科不是交叉学科的。国内很多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学科比较齐全。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人,学习一点别的学科的知识实属必要,而且也有这个条件。但是学了别的学科的知识,并不一定马上就能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水平。这涉及到如何学习和把各个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的问题,活学活用和融会贯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这可能就是“大师”不同于一般学人之处吧!

中国视角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或“中国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人主张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不应该过于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我的理解是,“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中国学派”、“中国视角”等等说

法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实际上指的都是要从中国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设。最近听到近年来一直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梁守德教授的一席话,我颇受启发。梁先生说,特色指的就是要从西方理论、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在体系、内容和概念上加以创新;特色是“自觉”行动,而不是“自发”行动。我想,如果从创新或独立的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理解有关“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中国学派”和“中国视角”等等不同说法,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共识。

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除了国际共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民族特性。国际关系研究(包括理论研究)的民族特性尤其明显。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如何做到国际共性与民族特性的平衡,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学习和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列主义有关国际关系的论述,也可以纳入西方学说之中),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

Kenneth W. Thomp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美国宗教与政治——Kenneth D. Wald 访谈录》,载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交流》2000年第1期,第69—75页。

有的中国学者不同意“交叉学科”的观点,强调是“独立学科”,我认为这两者似乎并不矛盾。

我认为,反对“中国特色”的人主要出于两个理由。其一,“中国特色”概念政治性太强,可能让人产生为现实政治作注释的误解。其二,西方学界并未强调创建自己的特色理论,结果反而产生了不少有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国人强调“特色”有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这是我自己对梁先生在最近一次会议上发言的理解。

大量的工作,其成果也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如何吃透外来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有自己特色的东西,还需要深入探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答案的。另外,如何从中国本身外交思想与实践总结出带有理论性的东西,从而推动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不时听到一些学者说,中国只有一些外交策略、外交思想,而没有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一些人士强调以“亚洲价值观”透视国际关系。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美国大使许通美先生,试图以“中庸之道”平衡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际问题。这能否给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点启示呢?

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也不足百年,但是已经形成自己的体系,流派、学说层出不穷,该学科可以说已经比较成熟。中国学者要想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必须吃透西方的东西,并将之为我所用,包括修正。当前中国学术界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中文表述让人费解,而且概念的使用十分混乱。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表述问题。在现有的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制度、机制、机构(institution),体制、规制(regime),范式、模式(paradigm),构建主义、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结构主义,认同、自性、身份(identity, self-identity),高位政治、低位政治或者高级政治、低级政治(high politics and low politics)等翻译不统一而且意思不甚明确。有些人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甚至根本不加注外文原文中的用词,这极易误导读者。

有些理论观点的表述,中英文使用的词语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意思很相近,颇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中文应该可以表述所有的意思,关键看是否

找到合适的表述方法。亨廷顿提出的单级—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正是我们所说的“一超多强”。同样地,如果把“一超多强”直译为英文,也是很别扭的。如戴维·香博(沈大伟)把它译为“one superpower, many major powers”,用英文读起来很不顺口,句子也长。还有亨廷顿说的“孤独的超级大国”(lonely superpower),同王缉思说的“高处不胜寒”意思差不多。肯尼思·华尔兹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批评相互依存理论的时候,谈到相互依存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即合作与冲突。我看到的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当今世界上,相互依存是不对等的,且既有合作式的相互依存,也有冲突式的相互依存,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中国学者使用的诸如“综合国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精神力量”等等,同约瑟夫·奈的“软力量”或者“软

许通美著:《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门洪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许通美在另外一本书中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见许通美著:《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李小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3页。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Winter 1999—2000.

王缉思:《高处不胜寒》,《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原话是:“Interdependence in some ways promote peace by multiplying contacts among states and contributing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It also multiplies the occasions for conflicts that may promote resentment and even war.”

权力”(soft power)也有相同之处。

目前国内一些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让人看不太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来词汇采取了生搬硬套的翻译法。很多理论著述里的词汇,对圈外人士来说是极其晦涩难懂的。例如目前在西方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intersubjective”,有人把它译为“互主性”,让人感到一头雾水。那些在中译文后面有加上英文注解的文章还好读一些,而看没有外文注解的中文著述则很不容易搞明白。最近看了一本翻译过来的、由日本学者写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书中很多概念我一点都不理解,比如“创造期望”、“指明角色”、“主体间性”,我很想查查原文中相对应的词是什么,可是找不到。此外,经常在国际关系理论著述中看到“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说法。这总是让我想起过去常说的“治理海河”、“治理淮河”和今天流行的“环境治理”,而这些“治理”似乎与英文里的“governance”不是一回事,所以“全球治理”也就难以让人理解。与其生搬硬套地造一些让国人望而生畏的洋味十足的词语,还不如好好地到我们的汉语宝库里找现成的表达方式。当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必要的外来语还是需要的,但必须加上注解。

如果说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是远期而且也是难以达到的目标的话,那么把外来理论吃透和用中国人可以看懂的语言表达清楚则是近期可以达到的目标。用自己地道的语言表述别人的思想,应该是走向“中国视角”的重要一步吧!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

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正毅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 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俞正梁著:《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 许通美著:《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8. Peter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9. Kenneth W. Thomp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作者简介:张小明(196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收稿日期:2001—01—15

责任编辑:刘 绯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陈志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

(日)星野昭吉著:《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